

《西楼苏帖》研究

郑道骏

内容提要：《西楼苏帖》，本名《东坡苏公帖》，由南宋汪应辰所辑刻，是苏轼最早的个人书法刻帖，艺术价值极高。本文主要立足于《西楼苏帖》的拓本问题，在此基础上对其帖石存佚及原貌、现存拓本及递藏情况、清代选刻本三个方面作细致的考证与梳理，以期对《西楼苏帖》拓本的全貌和源流有更深入的把握。

关键词：西楼苏帖 苏轼 拓本递藏 选刻

一、汪应辰与《西楼苏帖》
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。其书迹虽在北宋后期屡遭禁毁，但南宋后得到广泛的重视与流传。南宋刻帖之风盛行，雕版、椎拓以及造纸技术都较为发达。其中雕刻、纸墨皆为后世所重，四川更是造纸行业的重镇，所产的麻纸在宋代以前就已十分著名。这些客观条件为刻帖的刊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，《西楼苏帖》的刊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。《西楼苏帖》跋语云：

每搜访所得，即以入石，不复铨次也。乾道四年三月一日，玉山汪应辰书。^[1]

汪应辰（1118—1176），原名汪洋，字圣锡，信州玉山（今江西玉山）人，官至端明殿学士、吏部尚书，封上饶郡开国侯，谥号文定，故后世多以汪端明、汪文定、玉山先生等称之。汪应辰乾道元年（1165）至乾道四年（1168）任四川制置使、知成都府，在蜀期间勤于政事，且多有善政，又致力于文献的保存，《西楼苏帖》正是他主蜀期间所刊刻。汪应辰擅长书法，墨迹《中庸毕工帖》被摹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第十七册，现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周必大评价“玉山汪公名重天下，人得尺牋荣之”^[2]，王庭珪称其书法“皆纤锋细管，字小楷而清劲”^[3]。汪应辰的书法水准保证了他所收录苏轼书迹的质量，这也是后世对《西楼苏帖》评价如此之高的的重要原因。汪应辰还是理学大家，他对苏轼的文章书法和治学思想都颇有兴趣，曾在与朱熹的来往信件中探讨苏学的得失，并多次表现出同情苏学的倾向。所以他对于苏轼书迹的搜访并非心血来潮，而是出自对苏氏书

[1] 《宋搨西楼苏帖之一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8页。

[2] （宋）周必大：《跋汪圣锡与武义宰赵醇手书》，《文忠集》卷四十六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3] （宋）王庭珪：《书汪圣锡简后》，《卢溪集》卷五十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法及学问的崇敬，并且与他个人的治学理念息息相关。

遗憾的是，《西楼苏帖》原石早佚。南宋末年，蒙古军大举入侵四川，西蜀繁华之地饱受战乱，其中以成都尤甚。蒙军二太子阔端曾下令以火杀屠城，“城中百姓无得免者，火光照百里”，昔日沃野千里的成都，经过战争的摧残，已沦为“瓦砾之地”“膏血之野”，“青烟弥路，白骨成丘。哀恫贯心，疮痍满目，譬如人之身，命脉垂绝，形神俱离，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。”^[1]成都府治在这次战争中亦未能幸免，《昭忠录·王翊传》记载：

（端平丙申十月）二十四日，元兵步骑十万，至城都，入自东门……二十六日，府治火龙。^[2]

成都府治不仅被蒙军占领，更遭遇火灾。藏于府治之内的《西楼苏帖》原石，在这次战火中被毁的可能性极大，且端平三年之后，著录中再无关于《西楼苏帖》原石的相关记载。所以根据《昭忠录》的这则史料推断，《西楼苏帖》原石或已毁于宋理宗端平三年，即公元1236年。

故而，《西楼苏帖》在众多刻帖中是既珍贵又神秘的。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刻工与拓工之精，更在于所收录丛帖的墨迹现今大多不存；而神秘之处在于，其原石早佚，自元代之后就鲜被提及，至今仅剩孤本残拓，历代著录中的记载更是寥寥无几，如今只能从有限的史料中推测其全貌。

现存可考的关于《西楼苏帖》最早的记载是南宋陆游《渭南文集》中的三段跋语，分别是：

此碑盖所谓横石小字者耶？顷又尝见竖石本，字亦不绝大，数简行笔，尤奇妙可贵，与成都西楼十卷中所书《郭熙山水诗》，颇相甲乙也。绍熙甲寅十月二十二日，务观题。（《跋东坡帖》）

成都西楼下有汪圣锡所刻东坡帖三十卷，其间《与吕给事陶》一帖，大略与此帖同，是时时事已可知矣。公不以一身祸福，易其忧国之心，千载之下，生气凛然，忠臣烈士，所当取法也。予谓武子当求善工坚石刻之，与西楼之帖并传天下，不当独私囊褚，使见者有恨也。（《跋东坡帖》）

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，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，号《东坡书髓》。三十年间，未尝释手。去岁在都下，脱败甚，乃再装缉之。嘉泰三年岁在癸亥九月三日，务观老学庵北帘手记。（《跋东坡书髓》）^[3]

从这三段跋语中可以得出以下信息：

第一，刻于成都西楼下的东坡刻石拓本有两种版本，一种为十卷，一种为三十卷。三十卷本为汪应辰所刻，十卷本则没有言明刊刻者。且三十卷本中含有《与吕给事陶》帖，十卷本中含有《郭熙山水诗》帖。又，施宿主持的《嘉泰会稽志》记载：“汪圣锡尚书在成都集故家所藏东坡帖，刻

[1] （宋）吴昌裔：《论救蜀四事疏》，傅增湘：《宋人蜀文辑存》第六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656页。

[2] （宋）《昭忠录·王翊传》，守山阁丛书本。

[3] （宋）陆游：《渭南文集》卷二十八、二十九，汲古阁本。

为十卷。”^[1]施宿与陆游交好，且陆游曾参与《嘉泰会稽志》的编订并为之作序，故这条记载可信度较高，后代著录多有沿用，但研究《西楼苏帖》的学者却引用甚少。既然陆游与施宿都提到《西楼苏帖》有两种卷本，那就说明这种记载并非传抄、刊刻之误，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这与汪应辰帖后的跋语相印证，可以推测汪氏搜访苏帖乃是随辑、随刻、随拓，故有十卷与三十卷两种版本流传于世。

第二，第二则跋语中的“武子”，指陆游的好友施宿。施宿（1164—1222），字武子，湖州长兴人。由施宿之父施元之、顾禧注，施宿补注的《施注苏诗》中，有几则关于成都府治西楼刻帖的记载。《赠王郎诗》后注：“此诗墨迹刻石成都帖。”^[2]《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》后注：“墨迹刻于成都府治续帖中。”^[3]《送杨孟容》后注：“刻石成都府治。”^[4]这些诗注可以为我们佐证，施氏父子一定见过《西楼苏帖》，并且将此帖作为自己诗注的校本之一。而其中又提到“刻于成都府治续帖”，这更说明《西楼苏帖》确实存在续帖，也就意味着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拓本。

第三，依据第三则题跋，《东坡书髓》乃陆游从十卷本中所辑。陆游曾亲眼见过这两种卷本，并且从十卷本中“择尤奇逸者”，编《东坡书髓》一书。高士奇、端方的题跋亦将现存拓本系于《东坡书髓》之说，但多为藏家攀缘附会之语，并无实际证据。《东坡书髓》拓本的存佚，已是难以解决的谜题。

通过对陆游《渭南文集》中三段跋语以及汪应辰题于帖后的跋语的分析，我们对汪应辰与《西楼苏帖》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即《西楼苏帖》是汪应辰任四川制置使期间所辑刻的，汪氏辑刻此帖是以保全苏子遗墨为主要目的的，具有随访、随辑、随刻、随拓的特点，先成十卷，而后续成三十卷，故而史料存在十卷本与三十卷本两种不同的记述。

历代著录中关于《西楼苏帖》帖目的记载也十分稀少，直接言明刻石成都者寥寥无几。笔者从汪氏友人的诗文中发现不少关于其家藏东坡帖的记载，家藏之帖亦有很大可能被刻入《西楼苏帖》。这些著述的点滴记载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《西楼苏帖》的帖目构成情况。以下笔者通过表1进行梳理。

表1 《西楼苏帖》帖目见诸著录者

| 帖目 | 所见著录 | 具体记载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|
| 《与吕给事陶》 | 《渭南文集》 | 刻石成都 |
| 《郭熙秋山平远诗》 | 《渭南文集》 | 刻石成都 |
| 《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》二首 | 《施注苏诗》 | 刻石成都 |
| 《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》 | 《施注苏诗》 | 刻石成都 |
| 《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回作》二首 | 《施注苏诗》 | 刻石成都 |

[1] （宋）施宿：《嘉泰会稽志》卷十七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2] （宋）施元之、顾禧注，施宿补注：《施注苏诗》卷十七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3] （宋）施元之、顾禧注，施宿补注：《施注苏诗》卷二十二。

[4] （宋）施元之、顾禧注，施宿补注：《施注苏诗》卷二十五。

(续表)

| 帖目 | 所见著录 | 具体记载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|
| 《书刘君射堂》 | 《施注苏诗》 | 刻石成都 |
| 《送杨孟容》 | 《施注苏诗》 | 刻石成都 |
| 《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》 | 《施注苏诗》 | 刻石成都 |
| 《送文与可出守陵州》 | 《苏诗补注》 | 刻石成都 |
| 《梅花二绝》 | 《文忠集》 | 汪氏家藏 |
| 《水调歌头》 | 《文忠集》 | 汪氏家藏 |
| 《浴室院东堂》三绝句 | 《文忠集》 | 汪氏家藏 |
| 《王中父哀诗》 | 《文忠集》 | 汪氏家藏 |
| 《祭范蜀公文稿》 | 《文忠集》 | 汪氏家藏 |
| 《与林希论浙西赈济》三帖 | 《益公题跋》 | 汪氏家藏 |
| 《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》 | 《苏诗补注》 | 汪氏家藏 |

著述中所记载的帖目虽然数目不多，估计只占了原帖的一小部分，但却为我们勾勒出《西楼苏帖》的帖目情况，与现存的拓本还是比较吻合的。《西楼苏帖》的帖目构成十分多样，结合现存的六册拓本可知，苏轼本人的诗词、抄录他人的诗词、各种体裁的文章、书信、临摹作品等，只要是苏轼的手迹，就会被收录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汪应辰搜访苏帖，就是以求全为目的的，除了真伪问题之外，并没有进行更多主观上的遴选，所以今天我们所得见的拓本，传达出来的信息也就相对多样与全面。

《西楼苏帖》现存拓本中，存世有墨迹的仅有一篇，即《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》（下称西楼本）。将西楼本与墨迹本进行对比，不难发现两者有诸多不同之处。（图1—2）

《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》墨迹本现藏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，共14行，120字，且题目、落款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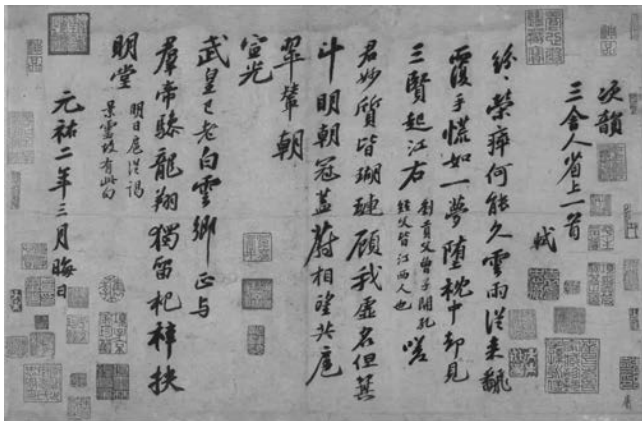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》墨迹本。现藏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尺寸：29.8cm×46.5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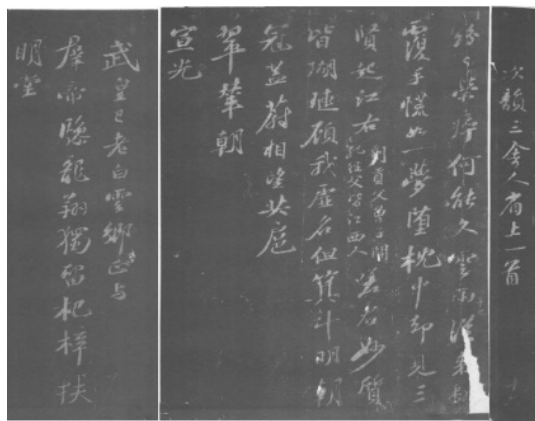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《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》西楼本。《中国法帖全集第六册·东坡苏公帖》，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。尺寸：19.3cm×22.5cm

注释应有尽有，内容较为完整。西楼本共11行，100字，落款和一部分注释缺失，形式上与墨迹本大有不同。

从形式上看，墨迹本题目分两行，西楼本仅一行；墨迹本题目后及正文后有落款，西楼本落款缺失；墨迹本“武皇……”三句后有东坡自注，西楼本缺失；墨迹本第四行“君”字抬头，西楼本没有。从文辞上看，第一处注释，西楼本“人”下阙“也”字。从书法上看，两帖虽然都是苏东坡的典型风格，但具体的细节差异较大。整体上，墨迹本的斜势比西楼本更强，如“舍”“瘁”“覆”“慌”等；具体细节上，墨迹本正文第二行“见”字最后一笔向上勾，而西楼本则向外甩出；墨迹本正文第八行“乡”字竖笔拉长，而西楼本则较为收敛……以上所列，皆是较为明显的差异，而细化到每个字，两帖完全不同。

而从书法的角度来看，西楼本明显更优，其用笔结字更为舒朗放松，墨迹本相比之下则稍显板滞。如“右”“妙”“名”“蔚”“扈”“群”等字的撇画，西楼本更为灵活，气质更佳，墨迹本中这些字的撇画则太过僵硬；“翠”“乡”两字的竖画，西楼本更为生动，且能看出苏书的典型风格，墨迹本则显得拘谨直愣。

综合以上的比较，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书法的差异上看，西楼本与墨迹本都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本子，笔者于此对这两个版本间的关系提出以下两种推测：其一，两个版本皆为苏轼所书，苏轼或是将此信抄了两遍，考虑到墨迹本中落款与部分注释的缺失以及抬头的不严谨处，则墨迹本《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》或为初稿，西楼本则是定稿。其二，墨迹本的书写水平远在西楼本之下，故亦可以推断，墨迹本《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》或是根据《西楼苏帖》拓本而作的伪作。至于两个版本间更为确切的关系，有俟诸位方家细考。

二、《西楼苏帖》之现存拓本

（一）现存拓本间关系考辨

《西楼苏帖》存世的拓本共计六册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五册，北京市文物公司藏一册。为便于直观地了解现存各拓本的具体情况，笔者列表2如下。^[1]

从表2可以直观地看出，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五册中，第一册与后四册装帧、尺寸不一，原分属于不同的拓本，我们研究时应将它们分而视之，暂且称之为天津四册本与天津单册本。单册本册首端方的题跋也证实了这一判断：

此西楼帖三本，旧藏英兰坡中丞家（名瑛）^[2]，甚加宝爱。由陕抚罢归，家甚贫，欲嫁女，无资，遂以三千金售归南海叶氏。光绪辛丑，余复从粤中收来。宣统元年，王子展兄复以故藏七卷归我，共成十卷。是汪圣锡刻坡书三十卷，又于其间择十卷，名《东坡书髓》，即此十卷也。十卷之散为七卷、三卷，不知其年，乃于今日复聚于宝华盒。殆有神灵与为呵护而凑

[1] 依西泠印社出版社《宋搨西楼苏帖》与湖北美术出版社《中国法帖全集第六册·东坡苏公帖》整理。

[2] 瑛瑛，本名瑛桂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为避河南巡抚英桂讳而改名瑛瑛。

合之者，岂非异事！^[1]

表2 《西楼苏帖》现存拓本概况

| 收藏地点 |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| | 北京市文物公司 |
|-------|--|---|--|
| 册数 | 四册 | 一册 | 一册 |
| 帖心尺寸 | 纵29.5cm | 横21.4cm 纵30.6cm 横23.5cm | 纵29.8cm 横 23.0cm |
| 开数 | 59开 | 25开 | 38开 |
| 装帧 | 纸圈档，锦面清装裱，蓝布套（附潘正炜题签） | 绫圈档，锦面清装裱 | 万字锦面，绫圈档 |
| 卷数 | 约七卷（无明确卷数，端方跋语中定为七卷） | 三卷 | 一卷 |
| 帖目数 | 第一册：11篇 第二册：15篇 第三册：20篇 第四册：8篇 共计54篇 | 20篇 | 13篇 |
| 铃印 | <p>第一册： 册首：“弢斋秘笈”“潘氏听帆楼藏”“季彤心赏”“伯荣审定”“吴荷屋平生真赏” 册尾：“弢斋秘笈”“伯荣审定”“吴荷屋平生真赏”“潘氏季彤珍藏”</p> <p>第二册： 册首：“弢斋秘笈”“季彤鉴定珍藏”“听帆楼藏” 册尾：“弢斋秘笈”“棠溪眼福”“伯荣审定”“吴荷屋平生真赏”</p> <p>第三册： 册首：“弢斋秘笈”“季彤平生真赏”“季彤秘玩”“潘季彤鉴赏章”，另有半枚“赐书楼印” 册尾：“弢斋秘笈”“潘氏听帆楼藏”“季彤心赏”</p> <p>第四册： 册首：“弢斋秘笈”“季彤审定”“听帆楼藏” 册尾：“弢斋秘笈”“伯荣审定”“吴荷屋平生真赏”“张维屏印”</p> | <p>册首：“晋府书画之印”“弢斋秘笈”“瑛兰坡家藏印”“雪村珍藏”“江村秘藏”“玉牒崇恩平生真赏” 册尾：“弢斋秘笈”“吴式芬”“诵孙审定”“铁岭瑛桂字年蕴号兰坡宝藏书画之章”“敬德堂图书印”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“晋府图书”“弢斋秘笈”“书髓楼”</p> | <p>册首：“晋府书画之印”“敬德堂图书印”“晋昌之章”“玄赏斋”“弱侯”“太史氏”“陈继儒印”“眉公” 册尾：“晋府图书”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“吴吴山”</p> |
| 题跋、题签 | <p>潘正炜题签：“宋搨苏文忠帖第x册，听帆楼藏。” 第一册：苏轼画像，小荷女史画，铃印：“吴氏禄卿”；潘正炜、徐世昌、何绍基题跋；吴荣光批注 第二册：苏辙、何绍基、陈其锜、杨守敬题跋 第三册无题跋 第四册：吴荣光、何绍基、张维屏题跋</p> | <p>册首：端方、杨守敬、郑孝胥题跋，阮元题签 册尾：黄庭坚、汪应辰、高士奇、成亲王、梁同书题跋 每卷卷首有原刻“东坡苏公帖”小标题</p> | <p>册首有“东坡苏公帖”小标题</p> |

[1] 《宋搨西楼苏帖之一》，第1页。

从题跋中我们可以得知,天津四册本有七卷,单册本有三卷,五册共十卷,本不在一处,宣统元年合归端方处收藏。至于将此十卷封为《东坡书髓》云云,不过是端方为了提高拓本价值的自吹自擂之语。之后杨守敬的题跋亦承端方之说,认为这十卷就是陆游所辑之《东坡书髓》。这些题跋也从侧面说明,关于《西楼苏帖》的拓本问题,至清代早已是一笔糊涂账,即使是如杨守敬这样专业的学者,也未能明辨这些拓本间的关系。时至今日,资料的搜集日益便利,新资料不断出现,我们对于《西楼苏帖》现存拓本间的关系,可以有新的审视。

1. 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(图3—4)

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应是《西楼苏帖》三十卷本的残本,证据有二:其一,天津单册本中的三卷,册尾题有“右东坡苏公帖三十卷,每搜访所得,即以入石,不复铨次也。乾道四年三月一日,汪应辰书。”直接说明这一册是汪刻三十卷本中的最后三卷。此外,每卷卷首皆有小楷“东坡苏公帖”的小标题,其中两处小标题下隐约可见“卷第二十九”“卷第三十”的字样。北京单册本的一卷卷首也有同样“东坡苏公帖”的字样,可见北京单册本与天津单册本共四卷,应同是三十卷本内之物,所收录内容乃苏东坡与友人书信,且文辞内容较为完整。其二,两册同钤有“晋府书画之印”“敬德堂图书印”“晋府图书”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等收藏印,这些收藏印都是明代晋府的常用印,在许多刻帖拓本中都可以见到,所以这两册应在明初同被晋府所收藏,更可以证实两册本应属同一拓本。至于两者装裱不一,可能是后来流传时不在一起所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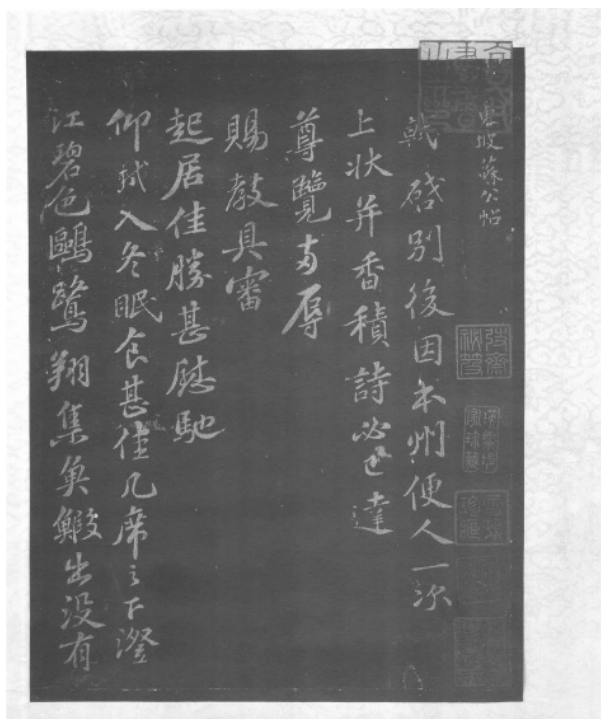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单册本。《中国法帖全集第六册·东坡苏公帖》,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,第10页。尺寸:20.0cm×28.4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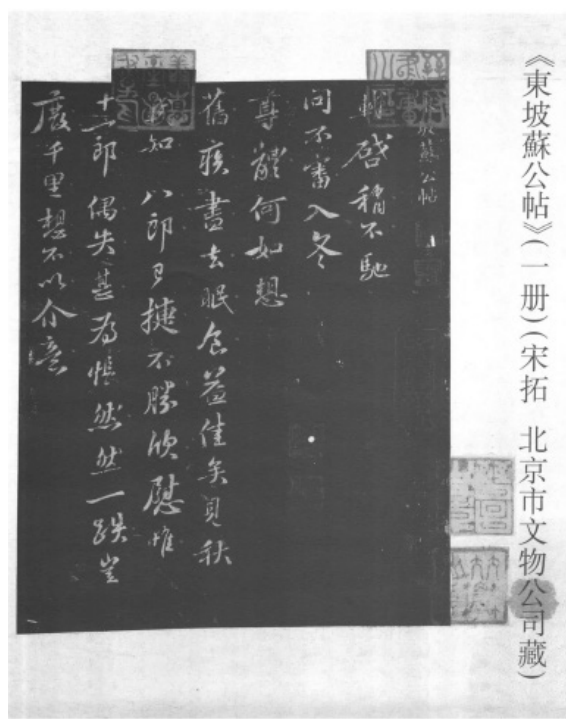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《西楼苏帖》北京单册本。《中国法帖全集第六册·东坡苏公帖》,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,第206页。尺寸:20.0cm×28.4cm

2. 天津四册本

天津四册本许多篇目首尾不全，且拓本有剪裁的痕迹，细究其内容，不难发现有不少与北京单册本的重复之处。不仅文辞内容重复，书法也如出一辙，只是顺序发生了错乱。按顺序梳理，北京单册本中《三月十四日与天觉学士书》中十五行（即“语相必”至“取可人可人轼再拜”）、《与退翁书》中三十三行（即“丧母当令长子迈来此指射”至“本官拖延也”）、《六月五日与天觉学士书》中九行（即“轼启羁旅索寞久矣见”至“眷遇深必不久远外会散舟中”），与天津四册本中的第二册相重复。

具体而言，北京单册本中《三月十四日与天觉学士书》《六月五日与天觉学士书》相重复的部分，在天津四册本中为一帖，且文辞通顺完整，书写时间应为三月十四日，北京单册本中《六月五日与天觉学士书》的后半部分（即“下根钝器所守如此不足为”至“天觉学士阁下六月五日”）应是从另外一封信札中剪接过来；北京单册本中所重复的三十三行皆是苏轼写给程正辅的书信，但前八行与后二十五行分属两封不同的信札，在四册本中两部分被分开，前八行被单独截出，后二十五行则在末尾处被另一封《与退翁书》的后三行嫁接于其后，导致后世误称。内容上错乱的重复、书法的相近共同说明北京单册本与天津四册本底本一致，但并不属于同一拓本。

与另外两册相比，天津四册本的底本来源则较为模糊，只能从零碎的史料中获得相关信息进行推测。据笔者考证，天津四册本应是十卷本的残本，依据如下：其一，前文提到，根据施宿在《嘉泰会稽志》中的记载，确证十卷本亦属汪刻。其二，周必大《跋汪逵所藏东坡字》提及汪氏一家曾收藏过的几幅东坡书迹，如《梅花二绝》、李杜佳句等，皆出现在四册本中；陆游题跋中“成都西楼十卷中所书《郭熙山水诗》”提到的《郭熙秋山平远诗》也出现在四册本中。其三，《施注苏诗》中四处提到位于成都的苏帖刻石，为便于比较，将其列于下：

《赠王郎》一首，一作《与王郎夜饮井水》，此诗墨迹刻石成都帖，而集中失载。

《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》二首，自此诗以下至《书刘君射堂》，凡七诗，墨迹刻于成都府治续帖中。

《送杨孟容》墨迹刻石成都府治，题云：送杨礼先知广安军。

《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》……诗跋刻石成都府治。^[1]

这四则诗注中，施氏提到“成都府治续帖”，鉴于尚未发现刻于成都府治的其他苏帖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将此“续帖”当作《西楼苏帖》三十卷本。施氏在注中明确指出“墨迹刻于成都府治续帖中”，则说明此诗应是三十卷本之物，若没有强调“续刻”，则该诗是被刻于最初的十卷中。而其中《送杨孟容》一诗出现在四册本中，并且题云《送杨礼先知广安军》，与施氏之注一致，说明四册本乃十卷本之残本。而其他诗篇未出现于现存拓本中，可见现存的拓本并非全帙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对《西楼苏帖》现存拓本的情况作如下梳理：《西楼苏帖》原有十卷本与三十卷本两种拓本，且三十卷本乃十卷本之续刻。现存拓本共六册，其中天津四册本是十卷本残

[1]（宋）施元之、顾禧注，施宿补注：《施注苏诗》卷十七、卷二十二、卷二十五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本，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是三十卷本的残本，且天津单册本是三十卷中的最后三卷。

(二) 现存拓本的递藏情况

据上文，《西楼苏帖》现存拓本共六册，天津四册本、天津单册本和北京单册本三组拓本的实际与流传不尽相同。

1. 天津四册本的递藏情况

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四册本是这三组拓本中所收苏帖最多的一组，印章与题跋信息较多，故递藏情况相对清晰。

拓本中时间最早的信息来自何绍基的两则题跋：

自吾石云师获此帖，基于乙未（1835）秋得观于长沙，丙申（1836）、丁酉（1837）屡观于京师，今己亥（1839）秋又观于福州。每展谛临模，神骨飘举，如列子之御风也，望洋自叹，释手复别。桑下之恋，息壤之约，敬记此，以俟诸异日。道州何绍基，将自闽旋都，倚装书。时九月廿八日。

同治癸亥（1863）夏，小住羊城。是帖久归南海伍氏，复从借阅，用油素双钩成册。忆乙未长沙秋试时，余购得此帖，为荷屋师强要去，虽诺见还，讫未允践。既流转它手，更无从问津矣，且得一再见为幸耳。道州蟺叟何绍基。^[1]

石云师、荷屋师皆指吴荣光，两则题跋相互印证，可知此帖最早由何绍基于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购得。第一则题跋未言及拓本被索去一事，可能是碍于师生关系而不敢言明，同治癸亥年再跋时吴荣光已经去世，所以何绍基直言旧事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据何绍基年谱，是年七月，何绍基赴长沙秋试，并多次拜谒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，两人多有书画交流，想必《西楼苏帖》的拓本就是在当时被吴荣光要去。吴荣光得到《西楼苏帖》拓本之后，便着手校勘，以拓本为底本，自藏的《宋槧苏诗施顾合注本》为校勘本，在拓本上进行眉批，历时三年。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至十八年（1838），吴荣光回京候补，何绍基在京参加殿试并考中进士，于京任职，又多次在吴荣光手中见到《西楼苏帖》。这三年间，南海人廖牲从吴荣光处借取《西楼苏帖》，选摹其中二十九首刻成《观海堂苏帖》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，吴荣光迁福建布政使，《西楼苏帖》亦随身携带，何绍基赴福建主考乡试时，又于福州得见之。吴荣光于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去世，在《西楼苏帖》拓本上留下了“伯荣审定”、“吴荷屋平生真赏”、“赐书楼印”（半枚）^[2]等印章及诸多眉批，是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四册本最重要的收藏者之一。

吴荣光去世后，拓本辗转到了潘季彤手中，潘季彤十分珍视，钤有“潘氏听帆楼藏”“季彤心赏”“潘氏季彤珍藏”“季彤鉴定珍藏”“听帆楼藏”“季彤秘玩”“潘季彤鉴赏章”“季彤审定”等收藏印，为四册本题签“宋拓苏文忠帖”，并且将其临作附于拓，在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

[1] 《中国法帖全集第六册·东坡苏公帖》，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43、103页。

[2] 吴荣光于道光十年（1831）在佛山建赐书楼，《宣统南海县志》收有所书《赐书楼记》一篇。

刊刻的《听帆楼法帖》第二册中，还摹刻了所藏四册本中的《调巢生诗》^[1]。潘季彤在广东收藏界小有名气，也常与许多书画家共同品鉴金石书画，陈其锽、张维屏便在他所藏的《西楼苏帖》拓本上题跋铃印。

潘季彤于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去世后，藏品四散，《西楼苏帖》拓本去向不明，直到何绍基在同治二年（1863）于广州南海伍氏手中得见。南海伍氏，钱松《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》一文^[2]定为伍崇曜。伍氏之后《西楼苏帖》拓本又不知去向。直到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端方汇集《西楼苏帖》五册（今天津四册本与单册本），在题跋中提道：“宣统元年，王子展兄复以故藏七卷归我。”才得知四册本拓本还曾被王存善收藏。伍崇曜、王存善、端方之后，《西楼苏帖》五册于1916年被徐世昌收藏，拓本上的“弢斋秘笈”便是他的收藏印。之后拓本落入其胞弟徐世章手中。1954年，徐世章去世，家人遵其遗愿，将其所藏文物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，《西楼苏帖》五册亦在其列。综合以上线索，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四册本的递传脉络大致为：

何绍基——吴荣光——潘季彤——伍崇曜——王存善——端方——徐世昌——徐世章

2. 北京单册本与天津单册本的递藏情况

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原同属三十卷本残本，原是一套完整的拓本，明代同归晋府所藏，拓本上均铃有“晋府书画之印”“敬德堂图书印”“晋府图书”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等收藏印。晋府宗室有藏书、刻书的传统，通过这些藏印可知，这两册拓本曾在晋府流传，且至少被两个人收藏。第一任收藏者是明太祖朱元璋嫡三子晋恭王朱栢，“晋府书画之章”是朱栢的藏印章。朱栢之后，这两册拓本流传到晋庄王朱钟铉手中，朱钟铉是朱栢的第三世孙，敬德堂是其藏书处，拓本上“敬德堂图书印”“晋昌之章”“晋府图书”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四方朱文印便是他的藏印。晋府之后，没有更多信息证明这两册拓本仍在一起流传，最晚在明末已被分成两册，以下将对它们各自的递藏情况进行叙述。

《西楼苏帖》北京单册本拓本上信息较少，仅存几方收藏印，所以递传信息相较其他两组拓本较为模糊。据秦公《北京文物商店藏〈西楼苏帖〉》一文，通过拓本上“玄赏斋”“弱侯”“太史氏”“陈继儒印”“眉公”“吴吴山”等收藏印，可知在明末清初曾被焦竑^[3]、董其昌、陈继儒、吴仪一^[4]收藏。且焦竑的藏印仅存在于北京单册本，这可以证明，到明代晚期，北京单册本与天津单册本已被分离。此外，陈继儒在其所刻《晚香堂苏帖》的跋语中自称并未见过《西楼苏帖》，且两方印章经鉴定确真无疑^[5]，所以他收藏《西楼苏帖》的时间应在成帖之后，即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。综合以上，《西楼苏帖》北京单册本的递传脉络大致为：

[1] 容庚：《丛帖目》卷二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798页。

[2] 钱松：《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》，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，2008年，第224页。

[3] 焦竑（1540—1620），字弱侯，号漪园、澹园，生于江宁，明代著名学者。

[4] 吴仪一，生卒年不详，约清圣祖康熙年间在世。字璩符，一字舒凫，又字吴山，浙江钱塘人。

[5] 秦公：《北京文物商店藏〈西楼苏帖〉》，《文物》1980年，第88页。

朱柄——朱钟铉——焦竑——董其昌——陈继儒——吴仪一

根据目前拓本上的信息,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单册本在清代最早的收藏者是高士奇,其题跋落款时间为“康熙己卯八月十三日”,即康熙三十八年(1699)时拓本在高士奇手中。高士奇之后,据成亲王永理题跋,乾隆五十四年(1789),拓本藏于枫泾谢塘处。再结合梁同书嘉庆元年(1796)的跋语,可知在清代中期,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单册本依次被高士奇、谢塘、梁同书、成亲王永理所藏。

道光年间,拓本先后为吴式芬、崇恩所得,两人皆在拓本上钤收藏印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),拓本被瑛桂所获,并于道光三十年(1850)被翻刻成《东坡苏公帖》。又根据端方跋语,可知瑛桂自“陕抚罢归”,即同治二年(1863)之后,拓本被南海叶氏收藏。之后又归端方、徐世昌、徐世章。综合以上信息,可知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单册本的递传脉络大致为:

朱柄——朱钟铉——高士奇——谢塘——梁同书——成亲王永理——吴式芬——崇恩——瑛桂——南海叶氏——端方——徐世昌——徐世章

三、《西楼苏帖》之清代选刻本

据上文所述,《西楼苏帖》原石或已佚于南宋末年,传世拓本仅余六册,最早到明末才重现人间,所以其递藏与选刻大多发生在清代。笔者已在上文对《西楼苏帖》现存拓本的递藏情况作出细致梳理,于此间亦可勾勒出此帖在清代的选刻情况,窥见其在崇苏、学苏之风盛行的清代中晚期所产生的影响。

(一)《观海堂苏帖》

《观海堂苏帖》是《西楼苏帖》的第一部选刻本,道光十八年(1838)由廖牲、孔继勋刻于北京南海会馆观海堂厅廊壁。帖石共15方,20世纪60年代悉数被毁,现今已全部佚失。《观海堂苏帖》帖石后有廖牲跋语:

苏文忠《西楼苏帖》诗文二帙,吴荷屋中丞所藏宋拓本也。余酷爱之,与孔炽庭太史选其精者,重摹诗二十九首,刻成置南海馆中。道光戊戌冬,廖牲记。^[1]

依据这则题跋,可知《西楼苏帖》(即天津四册本)当时藏于吴荣光处,廖牲与孔继勋从吴荣光处借来并选编其中二十九首诗,重新摹勒上石。廖牲、孔继勋皆为广东南海(今广东佛山)人,廖牲是京师南海会馆的筹建人,孔继勋精于书画,且在书画鉴藏方面颇有独到之处,他们从吴荣光

[1] 《观海堂苏帖》,程存洁主编:《容庚藏帖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,第61页。

处借来《西楼苏帖》并精选摹刻应在情理之中。

廖、孔二人对于《观海堂苏帖》帖目的选择颇有讲究。据跋语可知，《观海堂苏帖》的底本来自吴荣光所藏的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四册本的最后两册。现将其帖目列于下：

1. 《苏轼次韵苏伯固游蜀冈诗》
2. 《子由生日寿诗》
3. 《次韵三舍人省上诗》
4. 《送眉倅贾讷诗》
5. 《郭熙秋山平远诗二首》
6. 《和王明叟喜雪诗》
7. 《春来七绝》
8. 《雨中诗》
9. 《读孟郊诗二首》
10. 《次韵答刘泾诗》
11. 《章质夫寄崔徽真诗》
12. 《续丽人行》
13. 《提刑郎中伯伯挽词二章》
14. 《次韵完夫见戏诗》
15. 《调巢生诗》
16. 《王仲至见遗释栝诗》
17. 《昔年七绝三首》
18. 《熙明张侯万卷堂诗》
19. 《别山中诸道友诗》
20. 《都厅题壁诗并和诗》
21. 《次韵钱穆父还张天觉行县诗二首》
22. 《送杨礼先知广安军诗》^[1]

将这些帖目与吴荣光所藏的《西楼苏帖》四册本相比，不难发现廖、孔二人在遴选帖目时的用心之处。首先，所选篇目皆为诗词，信札、文章都不选入内，故吴荣光藏《西楼苏帖》四册中，第一册收录的赞、铭文、祭文等，第二册的书信尺牍，都未被选入。其次，在内容上，所选篇目的内容皆为东坡的自作诗词，吴藏《西楼苏帖》后两册中，有苏轼的临摹作品如《临右军讲堂帖》，苏轼抄录古人诗作如《杜甫暮归诗》《杜甫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诗》共三篇都未被选入。以上可见廖牲、孔继勋选刻之独特，加之刻手亦佳，底本为宋拓苏帖，所以《观海堂苏帖》的艺术水准较高，在清代晚期的刻帖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[1] 容庚：《丛帖目》卷三，第1153页。

(二) 《东坡苏公帖》

《东坡苏公帖》，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由长白瑛桂撰集、频阳仇和摹刻于开封郡属，凡三卷。

瑛桂（？—1878），全名郑瑛桂，号兰坡居士，汉军正白旗人，喜好收藏。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起任职河南，后十余年间便一直在河南任职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为避河南巡抚英桂讳而改名瑛荣。故他收藏《西楼苏帖》与刊刻《东坡苏公帖》时，用的还是瑛桂的本名。容庚《丛帖目》案：“此帖乃瑛桂所刻，张伯英误以为瑛荣。”^[1]乃是不知瑛桂身世之误也。

《东坡苏公帖》是《西楼苏帖》在清代的第二部选刻本，原石与拓本今已鲜见，只能从《丛帖目》所记载的帖目与题跋中得知些许信息。虽同为《西楼苏帖》的选刻本，但细究帖目，《东坡苏公帖》与《观海堂苏帖》内容迥异，原因在于两帖的底本不同。瑛兰坡跋：

……成都苏帖，世间所少有，惟吴荷屋所藏及此两残本。此本皆尺牘，吴本多诗文。^[2]

据前文关于《西楼苏帖》拓本的梳理，吴荷屋所藏乃今天津四册本，而瑛桂所藏乃今天津单册本，二者帖目无重合。《东坡苏公帖》与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单册本从帖目上看基本一致，但据张伯英考，其内容较底本“略有删节，比原本少一百二十余行，凡漫漶及字过小不易摹者，均节去”^[3]。可见瑛桂在刊刻时还是有所取舍。

(三) 《景苏园帖》第四卷

《景苏园帖》，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刊刻于湖北黄冈，由杨守敬选编、杨寿昌主持、刘维善摹刻。共六卷，其中第四卷的部分帖目与《西楼苏帖》天津四册本的第三、四册重合，且与《观海堂苏帖》重合。

杨守敬选刻《景苏园帖》的帖目及述评，共有十七页手稿，包括法帖名称、册数和选刻意见。陈上岷在《杨守敬选刻〈景苏园帖〉采用的原帖目录及述评》一文中将其全部录入，为我们了解《景苏园帖》的帖目来源和选刊缘由提供了许多一手的资料。杨守敬所选择的法帖共有22种，其中与《西楼苏帖》相关的有三种法帖，包括《听帆楼帖》、《观海堂帖》、《西楼帖》（指瑛桂刻《东坡苏公帖》），又由于这几种法帖之间的帖目多有重合之处，所以讨论《景苏园帖》的帖目来源时，便容易将《西楼苏帖》涵盖其中。其实并非如此，《景苏园帖》第四卷的部分帖目，并非来自《西楼苏帖》，而是来自《观海堂苏帖》。

张伯英曾断言：“光绪间，杨寿昌勒《景苏园帖》于黄冈，所收《西楼帖》（指宋拓《西楼苏帖》），即是重摹廖刻，惟廖本无题跋耳。”^[4]可并无给出具体原因。为了更加明晰《景苏园帖》与这几部法帖之间的关系，现将杨守敬的相关述评列于下：

[1] 容庚：《丛帖目》卷三，第1156页。

[2] 容庚：《丛帖目》卷三，第1155页。

[3] 容庚：《丛帖目》卷三，第1155页。

[4] 容庚：《丛帖目》卷三，第1154页。

《听帆楼帖》一册 春雨以下数帖，是从《西楼帖》翻出。然少锋颖，不如廖、英两刻之佳。

《观海堂帖》一册 此从《西楼帖》翻出。当时任铁笔为劳子六，子六故京师名手，守敬犹倩其摹《醴泉铭》一通，甚为精审。故此帖亦少失笔。大抵汪氏《西楼帖》去东坡未远，故所收皆晚年精到之作。此册几于篇篇尽善。然不能尽刻，此在尊鉴审择之。

《西楼帖》一册 此瑛兰坡从宋拓《西楼帖》翻出，稍嫌清瘦，然无大失笔，亦当选刻一卷，若有余钱则选刻二卷。并《观海堂》亦为两卷，尤为大观矣。^[1]

杨守敬虽亲眼见过宋拓《西楼苏帖》，也有题跋附于拓本上，却从未收藏过，题跋时间也晚于《景苏园帖》的刊刻时间，正如述评中所记，他所藏的皆是《西楼苏帖》的选刻本。又据前文，瑛兰坡所藏的《西楼苏帖》（即天津单册本），所收录的是苏轼的尺牍信札，其帖目未见于《景苏园帖》；而《听帆楼帖》中的数帖，虽选刻自潘季彤所藏《西楼苏帖》即天津四册本，却“不如廖、英两刻之佳”。所以，宋拓《西楼苏帖》与瑛桂选刻本被收入《景苏园帖》的可能性并不大。

再细究《景苏园帖》第四册的帖目，其中与《西楼苏帖》重合的帖目有《次韵苏伯固游蜀冈诗》《子由生日寿诗》《次韵三舍人省上诗》《送眉倅贾讷诗》《郭熙秋山平远诗二首》《和王明叟喜雪诗》《雨中诗》《次韵完夫见戏诗》《调巢生诗》《王仲至见遗释栝诗》《昔年七绝三首》《熙明张侯万卷堂诗》《别山中诸道友诗》《都厅题壁诗并和诗》《次韵钱穆父还张天觉行县诗二首》《送杨礼先知广安军诗》^[2]，共计16篇，这些重合的帖目亦在《观海堂苏帖》中，选编的顺序也相一致。区别之处在于《景苏园帖》所择的帖目皆是行书，《观海堂苏帖》中的一篇草书和五篇楷书都未被选入。据此我们可以推断，《景苏园帖》第四册部分帖目的底本，与宋拓的《西楼苏帖》无关，而是来自《观海堂苏帖》。

杨守敬对于自己精选监刻的《景苏园帖》十分满意，自跋道：“余意此帖虽后出，当为近世集苏书之冠，媲美《西楼》，凌跨《晚香》。”^[3]但以如今的眼光看，不管是刻工还是帖目的真伪，《景苏园帖》都有所缺憾。将《景苏园帖》第四卷中来自《观海堂苏帖》的部分与底本进行对比，不难发现，其结字明显松散，且转折稍钝，所刻苏书的精神气质逊色于《观海堂苏帖》，就更无从谈“媲美《西楼》”了。张伯英评道：“……其非善本，虽真且不必取。奈何美恶杂糅，视晚香殆有甚焉。”^[4]但与明清以来的其他苏帖相比，《景苏园帖》规模宏大，收录了苏东坡的许多传世精品，帖石达126块，刊刻完成后虽历经磨难，幸而最终保存完好，现完整地保存于湖北黄冈东坡赤壁的碑阁中，在现今全国苏书石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对《西楼苏帖》的帖石存佚及原貌、现存拓本及递藏情况、清代选刻本三个方面作了细致的梳理与考证，得出如下推论：《西楼苏帖》乃南宋汪应辰所辑刻，先成十卷，后续成三十卷，故传世有十卷本与三十卷本两种版本。现存拓本共六册，约十一卷，分藏于天津艺术博物

[1] 陈上岷：《杨守敬选刻〈景苏园帖〉采用的原帖目录及述评》，《文物》1983年，第86、90页。

[2] 容庚：《丛帖目》卷三，第1169页。

[3] 《景苏园帖》第四卷，程存洁主编：《容庚藏帖》，第64页。

[4] 容庚：《丛帖目》卷三，第1171页。

馆和北京市文物公司，其中天津四册本是十卷本残本，天津单册本与北京单册本是三十卷本残本，这三组拓本现可考的递传信息主要集中于明、清两代，并且在崇苏之风盛行的清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有《观海堂苏帖》、《东坡苏公帖》、《景苏园帖》第四卷三种选刻本。本文旨在通过这些考证与梳理，为《西楼苏帖》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。

(作者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)